

对华回忆录

东亚同文会編

商务印书馆

对 华 回 忆 录

[日] 东亚同文会編
胡 錫 年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69 年 • 北京

本書根據 1936 年日本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譯出。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記述自日本明治維新以至“九一八”事變為止大約七十年間日本侵略中國的历史。全書分成五編，每編敘述日本侵華史上的一個重要項目。內容所涉及的范围很廣，重點放在對我國東北的侵略上。

本書系日本東亞同文會所編纂。東亞同文會表面上是一個文化團體，實際上是日本侵略集團的特務機關。它編纂本書的目的，是炫耀侵略成果，策動更大規模的侵略。全書內容充滿毒素，可以看作是一份日本帝國主義自己提出的侵略供狀。把它譯述出版，是因為書中提供的材料，可以供研究日本侵華史作參考，也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貌和在中国的種種罪惡活動。

總之，本書徹頭徹尾是一株毒草，希望讀者善于利用本書中所提供材料，使毒草變為對我們有用的肥料。

對 華 回 憶 錄

[日] 東亞同文會編 胡錫年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7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 崇文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11017·82

1959 年 11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437 千字

印張 14— $8/16$

印數 1—4,600 冊

定價 (9) 2.20 元

譯 序

日本自从明治維新确立資本主义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为止，曾不断地向邻近国家进行侵略，中国便是它侵略的主要对象。尤其經過了第一次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因靠掠夺致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凶狠的帝国之一，侵略野心更为猖狂。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曾經描繪过一个日本統治集团所梦想的世界帝国，竟想征服整个东亚和世界。而侵占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又是它企圖征服中国和世界的起点。到了“九一八”事变一举而占有东北，在侵略者眼中看来，侵略中国的事业，已經奠定穩固的基础，建立世界帝国的前景，也似乎轉瞬在望。这时，正是可以謳歌以往的成果，为进一步扩大侵略作好准备的时机。《对华回忆录》就是侵略分子总结自明治改革以至“九一八”事变为止大約七十年間日本侵略中国事迹的一部罪恶史。

《对华回忆录》是由日本东亚同文会所主編。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了鼓吹侵略而組織的一个半官方团体，实际上等于一个特务机关。它是在1898年合并东亚会和同文会二个較小的組織而成的。1898年正是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第三年，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已經开始，而且已有了迅速的进展。但是由于力量还不够充实，不可能指望一举完功。而西方列强，这时正醞釀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企圖实现瓜分中国的阴谋。东亚同文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显然是为了結集力量，以便在日后看来更复杂的侵略活动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东亚同文会的反动本質，充分反映在它的組織綱領中（参閱本書第470頁）。根据該会成立时的決議，东亚同文会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引号內为原文，下同此）。即是在

日本还没有具备独占中国的力量以前，不坐视西方列强先把中国瓜分完毕。于是乃借保全之名，以保留日本独吞中国的机会，务使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不落在他入之后。（二）“协助中国及朝鲜的改革”。即以协助改革为名，积极干涉中、朝内务，篡夺主权。（三）“研究中国及朝鲜的时事”。就是在研究中国和朝鲜时事的幌子下寻求和制造各种借口，以实现侵略野心。（四）“唤起日本国内舆论”。就是在日本制造舆论，推动对中国的侵略冒险。东亚同文会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既是如此，以后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是完全全为侵略服务的。它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以文化活动为掩饰，在中国进行各种特务活动。它曾经在中国各地开办过许多学校，出版过各式各样的报章杂志，并编纂过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一批熟悉中国内情的侵略骨干，拉拢中国的亲日分子；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乃至在中国散布谣言，制造纠纷，挑拨军阀内战等等，东亚同文会的这些罪恶勾当，为日本以后大举侵略中国铺平了道路。东亚同文会就是这样一个日本侵略集团的别动队和特务机关。1934年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该会特在其下设置了一个对华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纂辑自明治改革起至“九一八”事变为止大约七十年间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大事和“有功”人员的传记。《对华回忆录》，就是这个编纂会的产物。其编纂目的在书中第一编总论中说得很明白，是要使侵略“有功人物”“流芳千古”，并以此鼓励后人“感奋兴起”“立更大的功业”。也就是说动员更多的日本人参与侵略、扩大侵略。这几句话把编纂的企图招供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华回忆录》的编纂目的是为了鼓励侵略，已如上述。而从事编纂的人员，正是曾经亲身参与过实际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①，它们对于日本统治阶级的阴谋企图，十分熟悉。因此，全书内容，不管是帝国主义者自身提供的侵略罪状，把它作为一份帝国主义者的

自白書譯述出來，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凶惡面貌和它過去在中國的罪惡活動。本書在編纂過程中，曾得到日本統治集團的全力支持。據編者自述，日本外務省、陸軍省、參謀本部、軍令部、駐華大使館、駐東北的領事館、“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會、大日本紡織同業會以及兒玉謙次、吉田茂、小幡酉吉等人，都曾給予大力支援。所有這些給予支持的，不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策源機關，便是親身參與侵略活動的首腦人物，于此更可看出本書的內容是如何反動了。但這裡也有一個好處，編纂者和編纂支持者掌握着相當多的第一手材料，這些材料是一般歷史學者所收集不到的，本書把這些在普通史籍中看不到的材料提供出來，對於我們研究日本侵華史是有用處的。這正是我們譯述此書的一個主要目的，變毒草為肥料。

本書原著，共有上下兩卷，體裁各自不同。上卷分成五個項目，綜述日本侵華史上的主要事迹，並介紹日本在經濟、文化方面侵略中國的機關團體和他們的活動。全書涉及範圍很廣泛，但以對中國東北的侵略為中心。本書所譯，就是它的上卷。下卷是附錄性質，全是各類侵略分子的傳記，介紹各人的家世生平，並表揚他們的略侵功績。因為這些材料沒有什麼參考價值，所以決定不譯了。

這本書是帝國主義分子為了鼓勵侵略而寫的，其觀點之反動，是可以想見的。書中的措詞用語，都不出帝國主義的口吻和一套混淆是非的慣技。例如事實明是侵略干涉，偏說成友好幫助，明是戰爭威脅，偏說是在維持安全和平，或保障條約權利。今日常從美帝國主義

① 本書的主要編輯負責人中島真雄，就是個一貫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分子。他曾在福建、北京、瀋陽等地辦過各種報紙，前後達三十年，同時和日本在華的各種軍政機關和特務都有聯繫，從事廣泛的侵略活動。其中在瀋陽活動的時間尤長，對於日本侵略東北的情況特別熟悉。本書第265頁和496—498頁也都提到他，單從這幾處看，就可以認明他的侵略面貌了。其餘參與編輯本書的人，也都是一丘之貉。

分子口中所能听到的詞彙，也就是本書所使用的語言。甚至把中国人民要求廢除不平等条約和收回主权的正义行动，說成是中国民族缺乏責任感，无視国际信义，違反条約的行为。而为了抵賴日本蓄意吞并朝鮮的侵略活动，反誣中国虎視眈眈，有变朝鮮为屬国的意圖。类此顛倒黑白的說法，書中几乎所在皆是。其实，如此明显的混蒙手段，是騙不了任何人的，帝国主义者尽管用心恶毒，也徒見其心劳日拙罢了。

書中对于中国和朝鮮人民的反帝斗争極端仇視，恣意污蔑，这也正是帝国主义的本色。例如本書称义和团为“团匪”，称朝鮮民族主义者为“朝鮮不逞之徒”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譯述这些称谓和語調时，究竟是否应予刪改，曾費斟酌，因考虑本書的翻譯出版，主要是供作研究的参考資料，并非一般讀物，所以应尽量保存原状。且侵略者的口吻笔調，貫徹全書，改动多了，不仅笔調不能一致，而且这样做，就会失去原書的本来面目，因而也有違譯述此書的原意。所以除極个别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改正外，基本上都保持原状。

此外，書中还有不少我国的地名，是我們早已改称了的，如“奉天”、“滿洲”、“京奉铁路”之类，有的我們自己从来就沒有用过这样名詞，純粹是出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捏造，如“关东州”、“滿鮮”、“南滿”之类。編纂人采用这些名詞本身就含有極显明的侵略企圖。但因特定的名詞，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含有特殊意义，地名也是如此，故不便更变。如果把它們一律改成今名，就难于准确地反映原意。所以，除作極少数的必要修改外，其余都保存原称。

以上所举，都是一些比較明显的毒素，但本書的反动观点，还远不止此。有的措詞虽比較隱晦，但含意却極为刻毒，甚至比公然污蔑更为險恶。这样的語句，也貫串全書。下面举一些例子：

(一) 用第三者的口吻，貌似客觀地陈述某些侵略活动和事件

的表象，而对帝国主义的幕后阴谋或事实本质，丝毫不提。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客观地就事论事，不掺杂任何色彩，实则是最阴险地混淆是非，既把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掩藏起来，又把最反动的毒汁，偷偷地灌輸进去。例如当北洋军阀混战年代，張作霖曾于1918年冬进兵至長江流域，发动内战。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由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曾出面干涉。日本被迫只好勒令張作霖退兵。但本書提到这事时却說，“張作霖被目为破坏时局的中心人物，由日本給予严重警告，因此，他在12月中旬，就返回奉天”。关于这事本身的是非，这里无暇詳論。問題在于本書的提法，是別有用心的。首先，說張作霖被目为破坏时局的中心人物，日本才警告阻止，似乎日本也很关心中国的統一和和平，反对内战。于是，就把日本因圖混水摸魚而調唆張作霖出兵的罪恶，輕輕地推卸了。其次，警告張作霖退兵仿佛完全出于日本自动，也就是把日本由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利害冲突而被迫不得不惺惺作态的实情掩藏起来，反装出一副伪善臉孔。最后，說張作霖因受日本的警告才回东北，等于說惟有日本的干涉最有效力，也即在暗示日本有足够的資格来干預或管理中国的内政。

抗日战争以前，日本在中国不断扩大侵略势力，不以既得的条約特权为鑒足，經常在条約范围之外，攫取权利，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承認。本書第四、五两編中列举的日本在中国所办的許多企业、学校，以及它們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是最粗暴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行为，往往沒有条約根据。但本書在叙述这些事时，竟絲毫不提中国主权問題，仿佛那都是日本理所当为之事。甚至还公然夸耀他們这种所作所为的“成績”。本書故意抹煞中国的主权問題，这是侵略分子最狡猾的抵賴。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管它采取的方式手段如何花样翻新，中国人民积多少年来反帝斗争的經驗，对帝国主义的花招是認識得很清楚的，本書的

編纂人以为可以把这些侵略活动抵賴过去，那是枉然的。

書中还有好多材料，編纂人都是这样处理的，把極其反动的内容，用貌似客觀的口吻叙述出来，借以掩盖真相。这比用露骨的侵略口吻来叙述，自然不会更好些，而是更为有害。

(二)本書第五編中，介紹了一大批侵略机关和团体，書中一律把它們說成是文化、教育、貿易机关和提倡中日友好合作的群众团体，仿佛它們的宗旨，是为了促进善邻关系。这当然是鬼話。不錯，这些机关团体的規章或宣言，确实是說得十分冠冕堂皇的，可是他們的实际活动，同他們的宣言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东亚同文会自身就是这样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机关，它把它的同行也如此粉飾一番自然是毫不奇怪的。例如日清貿易研究所成立时所标榜的目标，是为“培养能够担当中日貿易实际事务的人材”，若單看字面，确无甚可非难之处。但它的發起人和創辦人荒根精，是个軍人出身的侵略冒險分子，支持它的又是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和陸軍次官桂太郎。这二个人在当时(1890年前后)，正是策划侵略中国的首腦人物。在他們的支持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經費，全由日本政府——其实就是軍部資助的。而研究所的畢業生后来几乎全部参加了中日甲午之战，不是在軍中当翻譯，便是潛入中国内地做特务。这样的机关，难道还不是侵华軍事人員和特务的訓練机关嗎？与它表面上所标榜的培养貿易人材又有什么关系？編纂人为了隱瞞这些机关的真实性質，便于它們繼續进行特务活动，就故意把它作为教育机关来介紹，其实，不管它掩飾得如何巧妙，我們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三)对自己的侵略行为，有时也提出一些类似批評的言論。例如指責日本当局在和袁世凱签定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外交技术和宣傳工作都很拙劣(見本書第167及181—183頁)。又如談到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情况时，浩嘆气魄不足(第298頁)。

这些言論，誠然也是对侵略上的某些具体策略表示不滿，但决不是針對侵略本身，只是在方法方式方面，認為还應該研究，从而在侵略中可以避免失敗，获致更大的成果。至于浩嘆气魄之不足，立場更为明显，正可以証明原書編者的侵略野心是更为猖狂的。

(四)最后，應該指出，本書对于中国东北問題，用心特別恶毒，总想把东北和中国其他省分区别开来，說成是个特殊地区。不是說东北和日本有特殊的利害关系，便是說中国从来就不能在东北行使充分主权。例如本書第 368 頁上說，“日本之与滿洲，有密切关系”。第 309 頁上說，日本“付出了十万宝貴的生命、二十亿圓日幣作代价，……至少拯救了滿洲的命运，免受异种人的蹂躪”。第 290—291 頁上又說，辛亥革命时，“以滿洲而論，始終隱隱然繼續它那特殊的局面，与革命主流隔离，所以能够这样，畢竟由于在日俄戰爭中日本付出的貴重牺牲，必然地掩护了这一地区”。第 356 頁上又說，“革命党(按指国民党反动派——譯者)認為滿洲远离中国本部，形成單独的个体”。……类乎这样的謬說，全書不胜枚举。这无非表示本書对于强占东北和制造傀儡政权，特別重視，所以辯护也分外卖勁，力圖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的侵略东北，也自有理由的。

这样的例子，全書是举述不尽的，或是把侵略意圖，深藏不露，在表面上不著一字，或是用迂迴曲折的方法表达出来，用心的恶毒，原与公然誣蔑并无二致，只有在方法上更为狡猾阴險罢了。但是我們只要認清本書的目的和編纂人的立場就不难識破帝国主义分子的原形，任何巧辯，都无所施其技了。

总之，本書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充滿毒素的东西，其所以还值得譯述出来看一看，乃是因为書中所引用的材料，特別是其中引用的一些原始資料，可供我們研究这段历史作为参考。并且作为日本帝国

主义的一分侵略供状来看，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帝国主义的猙獰面貌和罪恶活动。但本書是完全站在侵略者立場說話的，內容極端反动，因而这些材料也不是簡單地拿过来就可以用的，这里还需要下一番甄別和考訂的工夫。譯者在上面举了一些例子，并作了一些分析，并不是在运用材料上提供范例，而只是用以說明本書的毒素所在皆是，提醒一下讀者閱讀时注意罢了。限于水平和能力，即使这样一些簡單的分析，可能还是沒有說得很清楚。深信讀者在閱讀和利用这些材料时，一定能够更好地加以批判和鑒別。

本書原著，除了以上指出的立場观点問題外，也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書中引用的材料，不注明出处，无法复按对校，且有所删节，也不加說明，除經查明与原出处有重大出入的已在譯注中說明外，一般都照原書翻譯。原書也有些錯別字^①，已經發現且有參考資料可資証明的，在譯文中已經訂正，其余只好存疑。

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以前采用阴历，和中国旧历一致，以后才采用阳历。因此，本書引用文件內所提到的日期，在1872年以前的，都是阴历，以后才是阳历。至于本書自身記述中所提到的日期，在1872年以前，有用阴历，也有用阳历的，相当混乱，原書也不注明，譯者因手边參考資料很少，不能一一查正，只能保持原样。好在为数不多，仅有几处。又書中多处提到“現在”二字，当然是指原書編写的时间，当在1934—36年之間，譯文中仍沿用，希讀者注意。

本書篇幅虽不算大，但涉及范围很广，譯者知識淺陋，語文水平也低，难免有錯誤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胡錫年 1959年4月2日于西安

① 人名誤者，如原書第144頁所举李鴻章赴日隨員名單中的罗庚齡誤作罗康齡。地名誤者，如第149頁中日議和条約綱領中所提的吳淞，系吳淞江之誤。時間誤者，如第296頁提到大正七年俄国革命爆發，当系大正六年之誤，折算公历才是1917年。凡此类錯誤，都已訂正。

目次

譯序.....	4
第一編	1
第一节 总說	1
附：遣使問題(所謂征韓論).....	6
第二編	28
第一节 中日修好条約交涉經過.....	28
第一項 預备交涉及訂約.....	28
第二項 关于台灣主权問題的对答及副島大使对覲見礼节的爭執.....	24
第二节 台灣征蕃事件	37
第一項 征討軍事.....	37
第二項 与北京政府的交涉.....	56
第三項 落合軍医監的回忆录.....	67
第三节 琉球藩屬問題始末	99
第四节 天津条約及日韓关系	120
第一項 天津条約的締結	120
第二項 江华島事件	125
第三項 壬午之變	130
第四項 甲申之變	131
第五項 日韓合并	133
第五节 中日講和談判.....	137
第六节 日俄講和談判.....	156
第一項 美国大总统的講和建議	156
第二項 會議地点的决定和全权代表的任命	158
第三項 會議經過	159
第四項 日本所要求的講和条件	160
第五項 有关东三省的北京条約	165
第七节 大正四年的中日交涉(所謂二十一条要求)	166
第八节 山东問題	183

第三編194

第一节 中日战役概記194

第一項 开战前种种經過194

第二項 平壤会战203

第三項 从黃海海战到休战204

特別任务班206

三国干涉始末206

第二节 义和团事变214

第三节 俄国对滿、朝的侵略235

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議會中的报告249

第四节 日俄战争記要253

特別任务班264

一、參謀本部所特派的諜报班 二、北京特別任务班 三、芝罘特別任
务班 四、滿洲义軍

第四編290

第一节 日俄战争后的滿洲290

第二节 关东都督府及关东厅的設立303

第三节 南滿鐵路株式会社及其業績309

第四节 面临革命时期的滿洲350

第五节 張作霖时代356

第一項 張作霖的崛起356

第二項 張作霖的統一东三省360

第三項 奉直战争时代的張作霖374

第四項 郭松齡之变385

第五項 張作霖的炸死393

第六节 張学良时代405

第一項 張学良就任保安总司令职405

第二項 張学良的排日方針409

第三項 滿洲事变的爆發415

第五編420

第一节 航运业發展至中国420

第一項 三菱会社421

第二項 共同运输株式会社424

第三項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425

第四項 大东汽船株式会社429

第五項 大阪商船株式会社430

第六項 湖南汽船株式会社430

第七項	中日汽船株式会社	431
第二节	銀行在中国的發展及其代表性企业	432
第一項	橫濱正金銀行	432
第二項	台灣銀行的創辦	434
第三項	朝鮮銀行	437
第四項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439
第五項	大倉組	441
第六項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442
第七項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444
第八項	在华日本紡織同業会	445
第三节	对华貸款事項	447
第四节	对华文化設施	465
第一項	社團的組織	465
	一、兴亞会(后改称亞細亞协会) 二、东邦协会 三、东亚同文会 四、东洋协会 五、同仁会 六、日华实业协会 七、日华学会	
第二項	教育措施	482
	一、东洋学館 二、日清貿易研究所 三、魯邻書院 四、福州东文学社 五、南京同文書院 六、东亚同文書院 七、北京东文学社 八、中日学院 九、江汉中学 十、振武学校	
第三項	汉文報紙	498
	一、汉报 二、閩报 三、咸报(即今天津日日新聞) 四、亞东时报 五、同文沪报 六、順天时报 七、盛京时报 八、泰东日报 九、济南日报 十、蒙文报 十一、大北新报 十二、滿洲报及民声 晚报 十三、全閩新日报	
第四項	日本政府所办的文化事业	500
	一、在外务省內設置文化事业部 二、事业概況 三、对滿文化事业	

第一編

第一节 总說

自明治以至大正、昭和，約七十年間，我日本国家的發展，实表現了世界史上稀有的偉績，發揚了人类对文化發展能力可惊异的特例。这一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对国家文化發展的能力，受到了素称先进的欧美各国白种民族的惊嘆。当明治天皇逝世时，曾有英国一家报纸，于刊文贊揚天皇的盛德大业后說：“明治在位四十五年間，亦即在不滿半世紀的短促的时期內，日本国民竟完全移植吸收了我欧洲諸民族过去历三世紀所發展建設起来的近代文化，我們对于如此偉大的国民能力的發揮，未之前見。”这样的評語，也并非过誉。从封建制度的国家，一变而完成了近代化的国家全貌，最雄辯地說明了明治文化的内容实质。

又，因日軍在日俄战争中的大捷，日本国家才开始为全世界所注意，遂至一跃而举世聞名。就中白色人种之以异常惊奇的眼光来注視日本帝国的跃进，其情况实在是超过了日本人的想象。

法国評論家某氏，認為日本的發展过于惊奇意外，曾对当时日本駐俄大使本野子爵^①提出下列質問說：“过去的日本，从未有一度出現于世界史上，今因在日俄战争中的大捷，忽然以可惊异的姿态，出現于吾人眼前，恰象在星斗縱橫的蒼空中，突然出現了一顆曳着光輝長尾的彗星。但是，倉卒出現的事物，也会在倉卒間消逝，正好象彗星般出現的日本，亦必将象彗星般湮然消逝的！”

① 本野一郎(1832—1918)曾任日本駐比、法、俄等国使节。1916年任外相。——譯者

据傳本野駐俄大使那时曾要求这位法国評論家提出对日本的疑点，結果他就提了数十条。本野对这数十条質問，加以說明，認為日本的出現于世界舞台，决非一时突起的、异常的；并且極力从历史上說明过去积聚的国民力量，一如西諺所說：“羅馬之成非在一朝”。則現代日本的雄姿盛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也是当然的了。

即使把建国以来，过去三千年間日本史發展的过程置而勿論，仅仅从王政复古、明治維新大业成立以来，国家七十年間的功业來說，实在也不外上下一体、朝野协力，以謀进取的气象的蓬勃發揚罢了。

明治天皇睿聖文武，具有不世出的英才，他率領文武百官及全国人民，明辨大义名分，指导国家發展，这实是明治时代日本的所以能冠絕世界、树立勛业的基本和根源所在。明治天皇于庆应 3 年（按即公元 1867 年——譯者）1 月 9 日以十六岁的冲齡踐祚，次年，即明治元年，下維新詔，以天皇亲政的大方針，公告天下，躬率諸侯公卿，禱告于天地神祇，立下誓文五条^①，决定开国进取的方針。从此，凡是內政、外交、軍事、生产等事务，都要一一亲裁。国民也都能依据明治天皇所宣布的国是国策，傾注他們豪迈的智勇和不懈的努力。內而举富国强兵的实效，外而对东洋和平發揚威力，出現了駸駸乎前进不已的国勢。

国家的發展，自有它的順序和途徑，因此，明治的开国，也自有梯阶存在，实为势所难免。自明治元年至明治 10 年（按即公元 1868—1877 年間——譯者），为庶政一新、統一国政的时期；及至 1877 年西南之乱^②平定，作为維新余波的国内紛爭，也就告一段落；从此，再

① 所謂五条御誓文为 1868 年 3 月 14 日明治天皇所宣告，其表面文章为：（1）广兴會議，万机决于公論；（2）上下一心，盛行經綸；（3）官武一途，以至于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打破旧来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實質上就是当时打倒幕府后还未巩固的天皇政府，为了爭取胜利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来参与“維新事业”而向封建武士和大資產階級所提供的的一个諾言，表示将尊重他們的意見。——譯者

② 西南之乱，是明治維新后，一部分封建士族，失去了旧日的特权，心怀不滿，因此發动的叛乱。叛軍以鹿兒島为根据地，因为偏处西南，遂称为西南之乱。在明治政府中失勢的軍閥西乡隆盛，是这次叛乱的領袖。——譯者

到明治 20 年前后約十年之間，国力逐漸充實，形成了對外發展的前提。加上海外文明的澎湃輸入與國民活力的洋溢，便奠定了異日雄飛的基礎。

明治 15 年，頒發了給予陸海軍軍人的敕諭，詔示帝國軍人所應努力的方向；明治 18 年，改革內閣官制，同時，樹立了責任內閣制；後來到明治 23 年，頒布了千古不易的大典，即欽定憲法，在時代上劃一階段；另又頒布教育敕語，確定了國民教育的方針。這一時期，正是明治日本的國本確立時期，在這二十多年間，國民上下的努力，真正發揮了異常的精力，因而使國基漸形鞏固。有了這樣充實的內容和進取的气象，才能出現躍進海外、雄飛大陸的壯觀。

果然，由於明治 27—28 年的戰役（即 1894—95 年的第一次中日戰爭——譯者），日本就一躍而為東洋的大國；再過十年，由於明治 37—38 年戰役（即 1904—05 年的日俄戰爭——譯者）中的大捷，一躍而為世界的大國；及至大正 3 年（1914 年），參加了世界大戰，遂至掌握了世界和平的樞紐，出現昭和聖世，成為確然不拔的世界三大強國之一。這種堂堂雄姿，充分預示日本將繼承白種人文明之後，擔任未來新文明新世界的中心命運。但是，日本的所以能有今日，固然由於上承明治天皇赫赫的盛德，同時也受到前輩志士輔佐天皇、負荷國運，又躬任種種國難、斬除荊棘、拓殖基業之賜。我國人民對於前輩的犧牲功績，也是不可須臾忘卻的。

明治 23 年，帝國憲法頒布，不但在日本史上劃一大時期，而且使國內有志之士間，蔚然勃發了興亞的思想，根據開國進取的國策，樹立東洋的和平，成為先知先覺的一大理想。清國的暴戾、帝俄的侵略，都是這些先覺志士所不忍坐視的，他們毅然興起，發揮為國殉難的壯志，鳩集四方同志，有的成立東邦協會^①，有的創設日清貿易研究所^②，確立了對外發展的第一步。他們的信念是：口舌之論，何足道哉！男兒應雄飛海外，勇往直前，為國力擴張而犧牲，雖暴尸荒野，